战略与安全
SECURITY & STRATEGY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STRATEGY TSINGHUA UNIVERSITY

CISS 海外信息专报

（2026 年 8 月 19-21 日）

1、美国《外交政策》：人工智能正改变军事道德准则

8 月 14 日，美国《外交政策》网站发表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研究与评估部门主任安东尼·帕夫（Anthony Pfaff）和曾任美国国务卿、国防部长演讲稿撰稿人的帕特里克·格兰菲尔德（Patrick Granfield）的文章《人工智能正在改变军事道德准则》。文章认为，人工智能的军事化运用正在挑战正义战争理论的现实意义。正义战争理论规定战争何时可以发动，以及应当如何运行。然而，当人工智能应用于军事领域，决策者与杀戮行为之间出现更多的中介环节。人工智能不具有怜悯心与道德能力，其在让诉诸暴力变得更加容易、精准的同时，也在威胁当前的问责机制。因此，正义战争理论必须针对当前的中介化战争形态进行更新。文章认为，一方面，正义战争理论应当重新链接收益与成本，以保证战争收益与成本得到适当分担；另一方面，其也应该更好地链接行为与后果，在人工智能武器系统投入运行之前，就建立防止平民伤害机制，而非在战争造成平民伤亡之后再追究责任。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6/08/14/ai-military-just-war/

编译：程果

2、美国《法律战》：人工智能宪法监管需平衡价值表达与公共安全

8 月 13 日，美国《法律战》（Lawfare）网站发表法律与人工智能研究所暑期研究员尼古拉斯·麦克穆兰（Nicolas McMullan）与期刊高级编辑凯文·弗雷泽（Kevin Frazier）的文章《谁来制定人工智能宪法？》。文章认为，随着监管重点转向塑造模型价值观的“人工智能宪法”，其中体现价值判断的表达性内容受第一修正案保护，政府应主要通过间接手段介入而非强制规定。“人工智能宪法”之所以成为极具吸引力的监管对象，主要在于三个特点：能够从模型开发上游影响后续行为；以普通语言直接被政策制定者修改；容易成为政治价值立场的象征。然而，越是体现企业自身价值判断的条款，表达属性越强，越可能受到第一修正案关于言论自由的保护。相较于模型输出，“人工智能宪法”可由可识别作者撰写、以公司名义发布、表达利益直接归属人类作者，因而具有更强的第一修正案主张。文章由此通过一系列美国判例指出，政府直接规定其内容可能构成基于内容的监管或强制言论。尽管如此，政府仍可以要求纯粹事实性的披露，通过公共采购设置条件，禁止人工智能实施特定违法行为，或直接规制其行为实现间接监管。文章最后强调，若政府能够随政治周期不断改写“人工智能宪法”，模型的价值取向可能随着政权更迭而反复变化，并进一步加剧人工智能价值取向单一化的风险。

https://www.lawfaremedia.org/article/who-writes-the-ai-constitution

编译：杜宛鸿

3、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应当对自主杀伤类人工智能实施裁军约束

8 月 13 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发表学者埃贝雷楚库·奥乌阿马姆（Eberechukwu Owuamanam SJ）的文章《机器不得决定谁该死亡：支持人工智能裁军的人道主义立场》。文章援引教皇利奥十四世相关通谕观点，主张关乎剥夺人类生命的决定绝不能交由自主算法机器执行，这是不可逾越的道德红线。文章认为，自主武器技术研发能力在全球分布极不均衡，技术优势国家可以无人员伤亡地发动打击，广大发展中国家则极易成为技术暴力的承受方，会固化全球不平等，甚至催生算法殖民风险。文章以历史上禁用致盲激光武器、毒剂武器作为参照，认为部分自主武器风险性质与之相近，不能仅依靠行业监管。当前超 120 个国家支持缔结相关条约，2026 年 11 月《特定常规武器公约》审议大会是开展谈判的关键窗口。文章并非全盘否定人工智能技术的价值，认可人工智能在民生与人道领域的正向作用，呼吁各方谈判达成有法律约束力条约，禁止专门针对人类的自主杀伤性武器，严格管控其余同类系统，同时吸纳多元人类文化传统参与人工智能治理，把人的尊严置于技术发展的优先位置。

https://blogs.icrc.org/law-and-policy/2026/08/13/the-machines-must-not-choose-who-dies-a-humanitarian-case-for-disarming-ai/

编译：钟珺雯

4、美国西点军校：防御性 AI 武器面临多重国际法挑战

8 月 12 日，美国西点军校利伯法律与战争研究所网站发表英国皇家空军退役准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荣誉教授威廉·布思比（William H. Boothby）的文章《当防御者变成攻击者，这重要吗？》。文章认为，如何界定并规制防御性人工智能武器的措施，正成为国际法领域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文章从三个维度剖析相关挑战：一是诉诸战争权层面。防御国为限制敌方使用人工智能武器采取的非武力干预，本身不构成武装攻击。但若防御措施导致导弹偏转并击伤第三国，将引发复杂的责任归属争议。二是武装冲突法层面。核心难题在于防御性人工智能系统是否会使防御者转变为攻击者。文章认为，若防御国夺取敌方武器控制权并造成破坏，应被视作新攻击者；若仅实施偏转且未针对特定替代目标，则难以界定为攻击行为。三是国际刑法层面。攻防系统间的人工智能交互给追究刑事责任带来阻碍。若敌方人工智能武器锁定目标，而防御方人工智能系统干预最终导致平民伤亡，法庭将难以厘清真正的肇事者是下令开火者还是实施干预者。文章强调，人工智能技术正从实验室快速推向战场，国际社

会需尽快厘清复杂的法律责任界定。

https://lieber.westpoint.edu/when-defender-is-attacker-and-does-it-matter/

编译：孙韵雯

5、美国兰德公司：中美人工智能发展形势

8 月 17 日，美国兰德公司发表政治学家乔恩·施密德（Jon Schmid）等人的文章《中美人工智能发展：来自一个新的人工智能开发者企业数据集的证据》。文章基于涵盖 1181 家中美人工智能开发者企业的新数据集，分析两国人工智能开发生态。研究发现，两国企业结构高度相似：均以 Transformer 为主导，约 20%从事基础模型开发，多数企业构建应用型人工智能产品，而非采用“模型即服务”或“推理即服务”的交付模式。最大差异体现在物理具身与软件之分：美国 61%的企业仅从事软件业务，集中于医疗保健、科学研究、网络安全等知识密集型垂直领域；中国仅 26%为纯软件企业，更多分布在人形机器人、地面机器人、自动驾驶等具身形态，以及制造、交通、能源等垂直领域。研究指出，数据不支持“美国仅追求单一架构路径而中国追求多种路径”的说法；但若通用人工智能最终需与机器人技术、世界模型和物理环境学习协同开发，中国企业更广泛的具身智能组合代表了一种美国人工智能生态系统所缺乏的有意义的对冲。此外，OpenRouter 数据显示，2024 年末至 2026 年 4 月，中

国开放权重模型的令牌量从接近零升至与美国持平，可能是因为中国开放权重模型以美国领先专有模型约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价格提供接近前沿基础性能。此外，该研究存在局限性：数据集仅反映截至 2026 年初的情况；公开信息来源覆盖不均，中国企业的信息缺失率更高；数据集仅涵盖商业性人工智能开发企业。

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A5043-1.html

编译：张佳延

6、美国兰德公司：构建纵深防御体系应对 AI 生物武器风险

8 月 18 日，美国兰德公司发表人工智能安全与技术中心研究员斯蒂芬·格拉（Steph Guerra）等撰写的研究报告《为人工智能时代构建纵深防御生物安全策略》，探讨人工智能与生物技术融合背景下的生物安全威胁与分层缓解策略。报告认为，人工智能与生物技术的融合虽带来变革前景，却也可能降低生物武器开发的技术、操作与动机门槛，甚至可能引发增强型或新型病原体的大规模攻击。报告的研究团队系统分析了生物武器开发全链条，评估了不同行为体在各阶段的能力差异，并据此提出由九项措施构成的纵深防御策略。报告强调，不同威胁行为体需要不同的预防机制，资源受限的个体可能在信息或材料获取环节被阻断，而技术先进或资源充足的国家行为体往往能够绕过访问控制。有效的生物安全策略不能仅依赖访问控制，资源充足的行为体仍可能突破

此类限制。策略需要辅以覆盖数字与物理领域的检测架构，在危害发生前识别并阻断滥用模式。此外，行为体在人工智能与生物生态系统多个节点上产生的分散信号，单独观察时可能模糊不清，但经聚合分析后可形成可识别的风险模式，这需要建立集中式信息共享机制。报告最后呼吁尽早投入相关研究、制度调整与国际协调，以保证生物安全。

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A4999-1.html

编译：张方琼宇

7、欧洲政策分析中心：人工智能加剧网络安全治理压力

8 月 17 日，欧洲政策分析中心（CEPA）发表其技术政策项目杰出研究员詹姆斯 •刘易斯（James Lewis）的文章《人工智能与网络安全：同样的挑战，更紧迫的时间》。文章认为，人工智能并未根本改变网络安全治理难题，但其自动化攻击能力大幅压缩应对时间，使长期存在的企业防护不足和国际追责困难更加紧迫。文章认为，人工智能黑客工具能够自动发现漏洞、识别配置错误并生成攻击代码，显著降低攻击成本、扩大攻击规模、增加误伤风险。由于许多企业长期低估网络攻击概率，在防御投入与风险承受之间倾向后者，中小企业和公共部门尤其缺乏资金和能力构建充分防护。未来量子解密技术发展还可能进一步扩大现有软件漏洞的暴露风险。文章认为，应对人工智能网络风险不能仅依赖技术手段，还需综合运用税收激励、监管、保险要求、政府采购和研发

投资等政策工具，并通过新的国家网络安全战略强化网络防御。同时，人工智能赋能的跨境网络攻击仍面临责任追究困难，国际谈判虽可限制技术滥用，却难以彻底消除风险。文章建议在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协议中强化核查和问责机制，并推动中美人工智能安全对话，以降低误判和失控风险。

https://cepa.org/article/ai-and-cybersecurity-same-challenges-less-time/

编译：高美琳

8、美国 Opinio Juris：AI 红线之争掩盖决策支持系统对国际人道法的冲击

8 月 17 日，美国 Opinio Juris 网站发表加州大学伯克利风险与安全实验室研究员、原 OpenAI 地缘政治团队负责人萨拉·肖克尔（Sarah Shoker）与乌得勒支大学国际法助理教授杰西卡·多西（Jessica Dorsey）的文章《测试极限：人工智能赋能目标识别、模型评估与国际人道法》。文章认为，Anthropic 与美国国防部 2026 年 2 月的合同纠纷已升级为“谁划定人工智能战争红线”的对峙，但领先企业设置的红线过窄，主要聚焦完全自主武器等极端场景，转移了对 Google、xAI、Palantir、OpenAI、Anthropic 正在部署的人工智能决策支持系统（AI-DSS）的关注。此类系统压缩决策时间、削弱监督、部署前缺乏透明测试。文章揭示三大制度短板：一是大语言模型安全测试高度依赖企业自我监管，国际人道法与

军事决策支持维度缺失；二是政府监管能力降低，国防部长赫格塞思（Pete Hegseth）将安全与法律程序称为“操作风险”，对军法署实施“无情审查”，平民保护卓越中心员工年内从 40 人减至 9 人；三是国防部宣称的“平民环境层”与人工智能助手将验证时间缩短 97%等成效未经独立验证，速度提升不等于平民保护改善。文章主张转向“全生命周期”治理：从设计到部署前均需进行严格语境特定测试、独立监督与透明度保障，并将举证责任反转为“部署前证明系统能在法律框架内运行”。

https://opiniojuris.org/2026/08/17/testing-the-limits-ai-enabled-targeting-model-evaluation-and-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

编译：张朔宁

9、美国《外交政策》：“科尔比主义”在“印太”地区或受阻

8 月 18 日，美国《外交政策》网站发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高级研究员德里克·格罗斯曼（Derek Grossman）文章《科尔比的“灵活现实主义”在印太地区行不通》。文章认为，近期美国负责政策事务的国防部副部长科尔比出访东南亚期间推广特朗普政府“灵活现实主义”的印太战略。这一战略虽意在扩大美国伙伴网络、强化盟友责任分担并集中资源对华威慑，但其战略灵活性可能被地区盟友视为不可预测性，反而削弱美国对华威慑。首先，美国一方面要求盟友承担更多防务责任，另一方面却保留随时重新考

虑自身安全承诺的权利。菲律宾难以大幅提高军费，日本也正竭力达到2%的目标；同时，科尔比拒绝保证澳大利亚能否按期获得首艘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进一步引发盟友对美国安全承诺的疑虑。其次，美国将有限军事资源集中于第一岛链及西太平洋方向，可能削弱印度洋和南亚地区，减少印度牵制中国的作用。再次，“灵活现实主义”过度强调军事竞争，忽视盟友对外交和经济支持的需求。美国关税政策已促使越南加强对华经济合作，印度则推动与欧盟达成贸易协议以降低对美国贸易压力的依赖。文章强调，若美国继续以交易主义取代持续且可预期的地区承诺，可能动摇现有盟友关系，并无意中赋予中国新的战略优势。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6/08/18/elbridge-colby-trump-asia-indo-pacific-china-strategy-defense-geopolitics-alliances-flexible-realism/

编译：贺宇希

10、美国大西洋理事会：美印贸易协议达成仍面临关键障碍

8月18日，美国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发表其印度问题非常驻高级研究员马克•林斯科特（Mark Linscott）的文章《美国与印度达成贸易协定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文章认为，美国和印度曾多次接近达成双边贸易协定，但最终因关税及市场准入问题而错失这一机会。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美谈判代表团威胁要暂停印度在美普惠制（GSP）下的优惠

关税待遇，并将工作重点集中于少数几个优先市场准入议题上。特朗普第二任期初期，印总理莫迪访美后双方启动全面双边贸易协定谈判，谈判一度接近达成，最终却陷入反复拉锯的“疯狂循环”。美最高法院撤销特朗普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关税后，特朗普政府转而启动《贸易法》第三百零一条项下的调查。文章认为，美印贸易谈判已陷入一个失败的循环之中，迄今仍未达成任何一项协议。要打破这一僵局，第一，两国领导人的持续对话至关重要，需采取直接跟进措施以推动达成突破性进展。第二，双方在开展谈判时应保留一定的灵活空间并愿意作出妥协。第三，协议应建立高度的互信，确保其各项条款得到切实执行。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dispatches/what-it-will-take-for-the-us-and-india-to-conclude-a-trade-agreement/

编译：李泓静

11、美国《外交事务》：后美国时代下各国需学会在“无秩序”中自我调适

8 月 18 日，美国《外交事务》网站发表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联合创始人兼主任马克·伦纳德（Mark Leonard）的文章《被遗弃的秩序：学会在后美国时代的环境中生活》。文章认为，美国主导的规则型国际秩序在扩张多年后正被遗弃，既未被中俄完全接受，也受到新兴中等强国的不满，而其主要出资者美国公众也已失去继续维系的兴趣。文章认为，旧

秩序并非只是短暂失灵，而是真的正在消失。美国仍是世界主要军事、经济和技术强国，却已难以阻止冲突、保障全球商业自由流动，甚至无法重新打开被伊朗关闭的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第二任期进一步从内部瓦解美国曾主导的秩序，但即便其任期结束，美国也不太可能恢复过去承担全球公共产品、警察角色和自由贸易倡导者的功能。文章认为，未来世界不会迅速转向中国主导的新秩序，而将进入由碎片化、传染性和“卡点武器化”塑造的“无秩序”状态。联盟和市场正在分裂，全球问题越来越依靠临时性补丁而非全球方案解决；危机也不再局限于单一领域，安全、贸易、金融和技术关系相互外溢。同时，各国越来越把能源通道、半导体供应链、金融基础设施和航运水道等连接性体系转化为施压工具。文章最后认为，美国前盟友不能继续以“建筑师”心态试图修复旧秩序，而应像“工匠”一样灵活利用残存制度、重建区域规则、发展技术主权和自我防卫能力。未来几十年将由危机浪潮和剧烈变化定义，成功领导者必须主动掌握自身命运，而不是等待一套新规则来拯救自己。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abandoned-order-world-mark-leonard

编译：刘晓

12、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民主社会主义候选人影响力有限

8 月 19 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发表其有效

公共管理中心（Center for Effective Public Management）主任、治理研究高级研究员伊莱恩·卡马克（Elaine Kamarck）、实习生里安娜·马赫塔尼（Riana Mahtani）和加布里埃尔·克雷默（Gabriel Kraemer）的文章《民主社会主义候选人在 2026 年取得进展，但影响范围有限》。文章认为，2026 美国中期选举初选中，一些与美国民主社会者（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有关联的候选人取得了胜利。部分民主党人对此感到恐慌，认为提名与主流选民政治背景不一致的候选人，会导致民主党失去重新控制两院的希望。但也有部分民主党人认为，民主社会者支持的候选人在初选中会持更温和的立场，并吸引新的年轻选民。文章统计全国获民主社会者背书的候选人情况，发现在 282 名获背书的候选人中，超过一半候选人竞选地方公职或州议会职位，而全美各州议会的议席超过 7000 个，可见这类候选人占全部候选人的比例极小。从地区分布来看，民主社会者支持的候选人本身来自共和党不太可能获胜的选区，但即使是在这些选区，候选人落选的次数仍多于获胜次数。因此，民主社会者候选人的影响力存在被夸大的现象。如今，美国是中间偏右的国家，共和党人会不断强调进步派候选人过去所发布的左翼言论，即使这些候选人正在清理、删除相关的社交媒体内容。此外，年轻的民主社会者候选人大多由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白人选民推动，反映出民主党内对建制派的不满和“后拜登时代”对高龄公职人员的反感。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democratic-socialist-candidates-show-gains-but-limited-reach-in-2026/

编译：高靓瑜

13、美国《国家利益》：加速入役核潜艇凸显美海军两难

8 月 18 日，美国《国家利益》网站发表自由撰稿人彼得·苏丘（Peter Suciu）的文章《美国海军是否在为加快潜艇入役而偷工减料》。文章认为，美国海军第七艘 Block Ⅳ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马萨诸塞”号（SSN-798）完成试航后，海军决定跳过常规的“入役后维修期”（PSA），直接将其交付舰队。PSA 通常是新舰艇在试航后进入船厂维修、排除试航中发现问题的关键环节，核潜艇的 PSA 往往长达一年。海军潜艇项目主管称这是“计算过的风险”，旨在加速战力形成，且未妥协潜艇质量与人员安全。支持者认为，跳过 PSA 反映了该艇的出色状态，也缓解了本已紧张的船厂产能和熟练工人短缺问题。但批评者指出，拖延而非取消维护只是将问题后移，可能导致未来更大的维修积压。文章认为，美海军此举实属无奈，随着俄亥俄级巡航导弹核潜艇陆续退役，即将问世的 Block Ⅴ弗吉尼亚级需填补这一能力缺口，避免战力断层已成更高优先级。文章认为，跳过 PSA 究竟是“计算过的风险”还是“偷工减料”，尚需时间检验，但此举折射出美国海军在扩张舰队与维护保障之间日益尖锐的结构性矛盾。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buzz/is-us-navy-cutting-corners-to-get-submarines-into-service-faster-ps-081826

编译：白一冰

14、美国《外交事务》：追求绝对安全的反恐战争致美国付出惨痛代价

8 月 18 日，美国《外交事务》发表布鲁金斯学会学者菲利普·H·戈登（Philip H. Gordon）的文章《反恐战争究竟是什么？》。文章认为，美国长达 25 年的反恐战争虽在保障美本土安全上取得成效，却因战略过度扩张给美国带来难以逆转的沉重代价。彼得·伯根在《所有总统的战争》中指出，受恐惧驱使，从布什到拜登的四任总统均深陷反恐泥潭，使反恐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范式。尽管美国成功削弱了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等极端势力，避免了本土再次发生大规模恐袭，但这一成就伴随着数万亿美元的经济消耗、数千美军阵亡及中东地区的人道主义灾难。反恐战争的根本症结并不在于战术误判或执行不力，而在于其战略目标错误：美国本不必发动一场波及全球的反恐战争，这场战争远远超出了消灭威胁美国的恐怖分子的范畴，反而妄图彻底消除恐怖主义这一政治工具，并重塑整个中东地区。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下，随着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转向大国竞争，漫长的反恐战争似乎正走向终结。文章认为，美国历任总统发动战争的主要教训是，恐惧和对绝对安全的追求会导致大国过度扩张，其

后果无人能够预料，也难以逆转。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reviews/what-was-war-terror

编译：陆知宜

15、美国 PIIE：美拟对黄铜管乐器加征 232 关税凸显国家安全关税泛化风险

8 月 17 日，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发表高级研究员卡伦·S·亨德里克斯（Cullen S. Hendrix）的文章《黄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特朗普关税将乐器视为国家安全威胁》。文章认为，8 月 6 日美国商务部就将进口黄铜管乐器纳入第 232 条关税范围征求意见，其理由是铜、锌均属关键矿产，加税可释放稳定需求信号并鼓励国内生产。文章认为，黄铜管乐器占美国铜消费比重极低，对铜、钢、铝生产拉动有限。美国学生级乐器主要从中国和东南亚进口，低价进口产品是学校音乐项目和初学者的重要来源。加税将抬高乐器价格，压缩音乐教育需求，并削弱美国音乐人才储备和文化资本。2026 年一季度，美国管乐器实际进口量较 2024 年同期下降 23.2%，有效关税率由 5%升至 17.3%。文章认为，美商务部此前认定进口航空器存在国家安全风险，但政府最终未加税。如今却拟对黄铜管乐器征税，显示第 232 条适用标准不一，可能更多受政治因素驱动。对此，文章建议美国国会或法院应为行政关税权设置更明确边界，防止国家安全概念泛化。

https://www.piie.com/blogs/realtime-economics/2026/weapons-brass-destruction-trumps-tariffs-target-musical-instruments
编译：黄千茹

16、美国《外交事务》：美如何维系并构建新联盟秩序

8 月 18 日，美国《外交事务》发表美国前常务副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Kurt M. Campbell）和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中国战略倡议项目主任杜如松（Rush Doshi）的文章《联盟何以存续：驳悲观论与美国构建新型联盟秩序之路》。文章认为，特朗普对美国盟友滥施关税威胁并对华对俄示好，虽严重侵蚀美国际信誉，却未至于瓦解美盟友体系。因有三重结构性力量始终支撑美国盟友体系：一是中俄威胁推动欧美与“印太”盟友的认知加速趋同，欧洲日益将中国视为产业竞争与俄罗斯战争能力的重要后盾，“印太”盟友也更加重视俄乌战争对地区安全的警示；二是盟友虽寻求对美“去风险”，但对美国市场、人工智能、云计算、先进芯片、军工体系及情报侦察能力的依赖仍在深化，美国也依赖盟友的关键技术、产业和投资，形成有力的相互依存；三是长期运作的军事、情报、贸易和技术和官僚网络及国会对盟友体系的跨党派支持提供了政治周期之外的稳定基础。文章强调，面对中国制造业、科技和军事规模优势，美国应构建“盟友规模”（allied scale），整合盟友市场、投资、技术和军事能力，将盟友体系从单向依赖美国转变为共同创造实力的平台。后特朗普时代

美国应重建信誉和长期制度承诺，以医药供应链和军火联合生产等小型具体项目为抓手，通过互惠和双向能力流动逐步扩大合作，最终塑造一个并非仅仅聚焦遏制中国，而是着眼于开放、繁荣，富有科技创新活力且得到盟友认同的新型联盟秩序。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how-alliances-survive-campbell-doshi

编译：郜捷

17、美国 CSIS：朝鲜“修正主义”驱动或促“特金会”重启

8 月 17 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表地缘政治与外交政策部兼韩国事务主席车维德（Victor Cha）的文章《伊朗问题之后：特朗普与金正恩峰会重启的情景》。文章认为，尽管许多分析认为金正恩因 2019 年河内峰会失败而不愿再与特朗普接触，但若以“修正主义”视角审视朝鲜外交，则其可能视新峰会为巩固核国家地位、分化美日韩同盟的契机。俄罗斯通过否决制裁延期决议与提供贸易及军事合作，已极大削弱联合国对朝制裁效力；中国亦大幅恢复对朝贸易。在此背景下，金正恩接触特朗普并非经济所需，而更多出于政治战略。朝鲜可能从美伊“后外交”模式中获取灵感：以含糊声明及后续谈判承诺换取外交突破，而非实质性弃核。对朝鲜而言，如果金正恩成为同时与美、日举行峰会的核国家领导人，将实现此前朝鲜政府未能实现的目标。

对日本而言，作为“防卫鹰派”与政治异数的首相高市早苗或创造日朝“尼克松访华”式的破冰机会。日方可借此解决绑架问题并降低短程导弹威胁。对韩国而言，朝鲜更可能采取“绕过首尔”策略，以孤立南方并分裂美日韩三边合作。中国在此场景中可能扮演微妙角色，中方虽警惕美朝接触损害其影响力，但为对冲特朗普“不可预测性”与俄朝日益紧密的关系，或通过促谈美朝来稀释俄罗斯对朝影响力。文章认为，这可能成为 6 月习特会后中国平壤之行的潜在议题。然而，即便此类外交启动，其解决弃核等根本性问题的前景依然渺茫。

https://www.csis.org/analysis/after-iran-scenario-renewed-trump-kim-summitry

编译：黎彤

18、美国 CSIS：美水务网络攻击更可能是伊朗的机会主义扰乱

8 月 14 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表情报、国家安全与技术项目高级研究员尼基塔·沙阿（Nikita Shah）的文章《美国水务部门网络攻击与伊朗问题：升级还是机会主义》。文章认为，近期针对美国至少 12 个州、100 个市镇水务系统的网络攻击虽呈现伊朗网络行为特征，但尚不足以视为美伊冲突升级。文章认为，攻击主要利用默认密码、联网运营技术和身份验证缺失等薄弱环节，延续了伊朗在冲

突中快速攻击易受侵目标的“机会主义扰乱”模式；伊朗政权内部决策碎片化，难以确认攻击是否由最高层直接授权。其主要作用在于通过攻击具有象征意义的关键基础设施制造恐慌、塑造信息环境并向美国本土投射力量。文章强调，将此类行动过早界定为升级可能反而放大伊朗的信息战效果。美国应强化关键基础设施网络韧性和防御能力，降低攻击的心理影响。

https://www.csis.org/analysis/cyberattacks-us-water-sector-and-iran-question-escalation-or-opportunism

编译：张泉

编译：陆知宜、黄千茹、张泉、郜捷、黎彤、白一冰、高靓瑜、刘晓、贺宇希、李泓静、程果、杜宛鸿、钟珺雯、孙韵雯、张佳延、张方琼宇、高美琳、张朔宁

审核：许嘉伦、钱嘉童、周武华、申青青、刘源、郑乐锋